

水立方，一座权力建筑的“后权力”命运

建筑 | 季艺 | 2013年10月14日



《天人合一水立方》灯光系统是水立方的新外观，由马文和郑见伟设计。

Courtesy of Ma Wen

2006年，水立方基本建成后，负责这座建筑建设施工的团队并没有撤出这个项目，他们从十几人扩充到了今天的七十多人，改制为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继续留驻水立方。而在此之前，他们只是北京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只负责建设的分公司，并不具备法人资格，职能仅仅按照上面的命令，承接施工工作。

奥运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这种由“上面”规定下来的留守，让一个施工建筑公司直接转型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经营管理公司，除了工程之外，他们开始要为这里的物业管理、招商引资、大型赛事、媒体宣传负责，这是他们此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事。

水立方占地62950平方米，为了让这座巨型建筑在奥运之后还能持续运转，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奇勇明白，他们最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努力保护在这租房子做生意商户们的利益，源源不断地为水立方创造客流，再源源不断地将其经营转化为财富。

杨奇勇和大部分人一样，他们对这里的信心来自于这座奥运标志性建筑对中国人而言与众不同的意义——水立方与有鸟巢别称的“国家体育场”并行矗立，已成为北京奥运乃至中国崛起的象征。水立方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场馆，从2003年开始筹建直至2008年最终完工，耗资总计约10.2亿元人民币；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外墙上面积大小不一、镀点不同的膜结构，辅以外墙灯光系统使其具有很强的观赏性。

不过，不容乐观的是，水立方的象征意义仍存，实际运营却并不乐观：杨奇勇透露，水立方第一个运营年度的游客人数是500万人，到了第三个运营年度则变成200万人。其中原因既有奥运光环的褪去，以及对这样一个维护和运营成本巨大的建筑的后续准备不足。“这使很多合作商的利益受损。”杨奇勇说。因此，在奥运过去四年后的2012年，为保持水立方对外持续的新鲜感，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计划更换掉水立方已沿用了四年的外表灯光系统。

这套灯光方案被内部人形象地称为“大花布”，它还有一个更官方的名称叫做“节庆模式”：每逢节假日或者有领导视察的夜晚，你能看到各种颜色、图像在水立方上毫无逻辑地不停旋转，“其实也挺炫的，比较刺激，但这样的东西放一年老百姓肯定就厌了。”杨奇勇说。

令人意外的是，之前水立方的“大花布”图案并非由具有美术或设计背景的人制作，而是由负责照明的硬件商提供的。“在中国，（甲方，亦即出资方容易有这样一种意识），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花了几千万去做这个灯，往往会说你们顺便再给我们做一些漂亮的动画吧，不要说艺术家，这些动画甚至不是灯光设计师做的，而只是硬件工程师卖材料之后免费附赠的。”纽约艺术家、对奥运园区的设计多有参与的马文说：“他们没有意识到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油彩这个材料很便宜，但是它画出的画的价值可以是很客观的。”2008年，在北京奥运向全球展示中国形象时，这块由硬件商提供的“大花布”就这样出现在了各国主持人的背后，这让马文非常惋惜。

马文正是水立方新灯光系统的设计师。当水立方人流量下降时，“国家游泳中心”通过奥运照明总设计师郑见伟找到马文，他们希望艺术家马文与照明设计师郑见伟共同为水立方创作一套新的作品。这套名为《天人合一水立方》的新灯光系统耗时一年，最终在2013年6月向公众展示。设计中的种种曲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参与者，也或将改变水立方的命运。

马文是北京奥运开闭幕式核心创意组的七个成员之一。2005年，她和艺术家蔡国强、沈伟等纽约艺术家组队参与了奥运开幕式的方案竞标，在在600多套提案中，他们的竞争对手有张艺谋、陈凯歌、李安甚至崔健。最终她入选核心创意小组并担任视觉特效主任设计，当谈到最终为什么能被奥运选中时，马文说：“我们跟国内的其他都不一样，他们每一家都是要去争总导演的职位，我们明确说，我们当不了总导演，无论是谁当总导演，我们来帮这个开幕式更艺术、更国际、更当代。”

而除了开闭幕式外，马文还为奥运园区一座鲜有人知道其功能建筑的LED制作了动画。这是水立方西北方一栋叫做“数字北京”纯黑色大楼，它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完全封闭的巨型机房，由建筑设计师朱镛设计，由于功能所限，朱镛不能在这座建筑上发挥太多，建筑外墙上一个不规则的LED，是设计的重要体现。

在中国建筑界，LED屏幕往往会被甲方看作是一种身份象征，尤其对于由政府主导修建的建筑。当领导来参观时，LED能够更好的表现业绩。而对于业主而言，他们希望花最少的钱作出最气派的东西，建筑界普遍过快的建设速度让他们来不及花费太多的力气与金钱在细部品质上，比较肤浅直白的解决方式便是LED的相关产品。相对于其他设计而言，LED更廉价。

作为建筑师，朱镛并不懂视频内容，为了阻止悲剧发生，他找到马文，因为中央领导要来视察奥运会各个方面，LED不能在领导视察时仍是黑的。

就这样，正在做开幕式的马文没有签约就进入了这个项目。她用水墨的方法在这座纯黑的建筑上画出了流动的水、飘动的风，骑着马的旅行者，它们可以与节气、人流、大楼里的动态互动发生变化，这些画面让“数字北京”摆脱了它作为一个巨大机房的尴尬存在。

马文出生在北京，她的父母是中国最早的计算机工程师，12岁那年，她随全家前往美国。由于出国太早，马对中国很多东西不是很理解。但奥运改变了这一切。中国政府与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让这场运动会的开幕式变成了一次信息量很大的中国传统教育。参与开幕式的过程里，马文就像奥运企图改变的那些外国人一样，深深被这种教育感染。“跟张艺谋做头脑碰撞会，光谈‘什么是中国’就谈了整整一年。”马回忆。在此之后，马的创作发生了变化，她把墨等中国材料大量运用到了作品中。

起初水立方的负责人对新灯光系统的设想与“数字北京”类似，他们希望马文再次创作一个那样的动画，马拒绝了这种简单的复制，她想要做一种更传统，也更具中国当下意义的公共艺术。

马文的想法得到了郑见伟的支持。作为一名照明设计师，郑见伟的职业在中国的设计师领域并不常见。以往大部分照明设计师都是雷士、飞利浦等灯具企业辞职创业的高管，他们拥有更廉价的货源，更多的也是在打着设计师的旗号售卖灯具。

郑见伟讲了这样一个例子：2009年，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希望拿下一座位于汉江汇入长江口处的武汉地标性项目。“湖北省书记非常关心这个项目，但万达当时做不出那么多出位的建筑，他们那时非常保守，只能做简单的、便宜的、火柴盒式的商业地产，”郑回忆说，“万达每次汇报都是王健林亲自去，方案一直通不过，王健林急了，但又不想在建筑设计上花费太多，有人出主意，可以找奥运的人，在建筑上搞灯光照明和烟火，在此之前，万达从来没有请过照明设计师。”

就这样，王健林找到了郑见伟，郑很快用鸟巢以及水立方等奥运园区的灯光效果“改造”了王健林项目的设计，这使得万达的方案得以通过：在政府看来，这些建筑在夜晚看起来就像是水立方或者鸟巢那样，这是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这既帮助王健林顺利度过了设计升级之前的尴尬期，此后也影响了一大批照明设计师，他们发现可以通过照明设计赚钱了。

这个过程中，郑见伟发现他童年的很多东西慢慢在被唤醒。“我从小喜欢艺术的东西，”在采访中郑见伟说，“但父母认为这作为爱好没问题，但你的本职应该是数理化。”当发现他可以不必再通过卖灯具养活企业时，他的梦想是只做设计不再涉足任何的销售。

郑见伟对中国地产开发商品位的变化充满信心，他认为他们是可教育的，品味正变得越来越好。谈起他的合作伙伴王健林的照明品位时，郑见伟说，王之前只能欣赏那些纯色、艳俗，比较亮的灯光，比如纯红或者纯粉，但现在，他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中间色更加高级。“他需要一个过程看到你看到的东西。”在此之前，照明设计职业一直被中国官员与地产商叫做“亮化工程师”，“他们当时的诉求简单而言就是要亮、炫、艳”，郑见伟说。但事情正在起变化。

作为一个从飞利浦这种照明企业高管转型成的设计师，郑见伟欣赏一种极致而纯粹的艺术观，也是他坚持要使水立方的新外观艺术化而非娱乐化的原因。他与艺术家蔡国强和韩美林都合作过。在与韩美林合作的一个叫做《天书》的艺术项目，韩在那个项目中要创作一个万字体量的书法作品，“他写到了什么程度呢？”郑见伟说，“他写到笔长在到肉里去了，你可以想象这种专注程度。这种东西别人比不了。”

在郑见伟北京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副抽象主义油画，郑主动谈及中国人和西方人面对这幅画的不同表现：“中国人会说还行；但西方人则会给你讲很多东西，从这幅画看到了什么，为什么，老师从小带他们带着去美术馆或者街头讲这些作品，他积累了很多。”郑说，“咱们中国太差了，可能到富二代、富三代才能有积累，我们等不及，我创造了一个新词，叫‘自己做自己的富二代’。”

有关艺术的审美是一种私人化的体验和趣味，但是在中国，掌握资源者的个人审美往往影响深远。中国的公共建筑设计与公共空间往往受到官员与地产商的强力影响，他们的审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城市景观的审美。

郑见伟和马文希望水立方能够做成一个艺术项目。当谈到自己如何理解这座建筑时，马文说，“水立方是把镜子，它反应了人的状态，跟大自然的气场有关，跟我们直接所处的社会有关。水立方本就是地，我还想加上天、人，但又不能什么都拿出来，反倒太杂乱了。”她相信中国古老哲学里一定有能表达天、人、地三者关系的東西。

马文先是想到黄历，“整个黄历会说今天办丧事，明天不要出门”，但很快，她发现黄历通过占卜体现出的人与上天的关系不符合她对这件艺术品的期许，“黄历有一定道理，但中国人很实际，黄历其实是把一个很深邃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很简单实用的东西”。马文希望寻找黄历的源头，通过一个研究风水的教授，她得知黄历与风水都来自易经。

当决定要用易经改造水立方时，她的妹妹马佳帮助了她。马佳曾在一家大型建材商场担任总裁助理，这类公司通常位于北京南城那些大片大片厂房般的家具城里，由于建筑规模巨大，他们的老板喜欢找那些风水师傅研究房子该盖成什么样会更有利于他们的生意，“哪边应该高、哪边应该低，怎么组合才能符合时空的流动。”这家建材商场的—个风水顾问任重说，马佳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姐姐。

马文希望她的作品是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而不是那种“把一个美术馆里的东西放大一百倍，硬放在一个公共空间里”的中国常见的装饰性创作。风水顾问任重为马文算出了未来—年里每一天的卦象，这决定了这一天水立方基础的灯光底色。郑见伟则建议在这种底色下，用电脑程序将—天中新浪微博上的表情统计出来，按照情绪的不同影响水立方上的波动的强弱、颜色的深浅、灯光的明暗等等效果变化，以表达社会情绪，例如红、黄等暖色代表亢奋、愉快甚至有点浮躁的微博情绪；蓝、灰等冷色则表示平静。“天人合一水立方”的项目经理石巍巍在—先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解释：他们找了家网络公司，每天下午三点收集新浪微博过去24小时内出现的表情符号，这些表情少时上千万，多时上亿。现有的微博75个符号表情归纳为八大类：“爱、喜、扬、欲、惊、怒、悲、抑”，统计数字送到另一家公司，变成灯光操纵信号，发送给水立方的灯光控制系统。

这种设想在—开始遭到水立方的质疑。“他们艺术家的理念比较深，但是视觉上也许并不漂亮。”杨奇勇说，他期待—种更加直白具象的表达。比如，当这套新的灯光系统在—次测试时，杨奇勇要求雷电效果出现的要更加频繁，“不要—秒才闪—个”。

事实上，杨奇勇的担心不无道理。在世界范围内，出于—种炫目、时尚吸引游客的考虑，帝国大厦或者巴黎埃菲尔铁塔这类知名建筑很少会采用公共艺术这种含蓄的方式呈现自己，它们大多使用的都是更具娱乐效果与让人印象深刻的灯光秀。

不过，水立方在结构上却限制了这类“灯光秀”的可能。“通体透明”与“气枕”结构是水立方在设计上的核—心理念，水立方的外膜由3065个不规则的气枕组成，为了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到水立方内部，在这些膜上又有无数的

颗粒将强光通过漫反射分解。这种结构让水立方并不适合播放那些普通LED上具象的画面：经由气枕空腔与表面两到三层夹膜的多重反射与折射，完全不知道具体的画面会变成什么样子。这给了马文与郑见伟在国家游泳中心前坚持他们想法的可能，“对这个艺术项目而言，这是一件好事，一旦水立方可以跟彩电一样，国家游泳中心就不会再允许拿彩电做一件抽象的事。”郑见伟说。

抽象的另一个好处体现在政治上。在一开始听到艺术家将用微博表达社会情绪时，国家游泳中心担心负面情绪过多出现会带来政治风险。但很快他们发现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关注这件事的人，可以去联想；不关注这件事的人，这就只是一个图像。”杨奇勇说。

水立方面对巨大的经营压力，除了因为奥运意义的淡化导致游客人数下降外，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则是，中国在过去十年间建了大量巨型、充满设计感的权力建筑，大型建筑绝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投资项目，但这个国家明显没有预想到建完之后将会产生的巨大支出。

杨奇勇介绍说，2011年，水立方的自营收入约为8800万元，但场馆维护、资产折旧、能耗等在内的成本费用总计则达到了9929.9万，占总支出比重的58%。按照杨奇勇的计算，这个数字意味着每使用30年，水立方的维护费便能达到它的建设成本，相当于又建了一个新的水立方。“这块成本恐怕我们是探索者，没有现成的数据给我们，特别是政府在修建前也没有对此准备的那么充分，将来政府也许会特别申请制定新的政策。”杨奇勇说。

在鸟巢、国家大剧院这类权力建筑疯狂建设的十年里，高楼拔地而起，但后续的问题逐渐显现。水立方的问题并非唯一，比如在古典音乐氛围并不浓厚的重庆有着中国规模第二的剧院，船型剧院坐落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一块三角形空地上，为保持一个完整造型，设计师不能在外墙打出任何过大面积的孔洞，致使演出前所有运载设备的车辆都要先开到地下，再通过一个特别订制的巨型电梯把道具音响运上舞台，每次演出，单这一项就要花费一万多元人民币。

水立方尝试了大量办法改善经营。这包括与“心跳水立方”这种以跳水为卖点的电视综艺节目合作；为吸引政府文化扶持政策的拨款，还将自己变为一个艺术中心，定期进行书画拍卖。水立方内部甚至还被划成细小的单元，分租给4D电影院、烤香肠摊位，在场馆里还发现一种只有在中国三、四线城市的公园才会看到的，叫做“吃奶鱼池”的游戏：在一个长宽只有五六平方米左右的池子里，人们围在那里拿着一个棍子，棍子的一头有一个沾着营养液的奶嘴可以让鱼吸吮。除了大量出租给这种与水立方气质不符的商贩之后，水立方的大厅则变成了一个介绍各省旅游项目的展区，在那里，可以看到巨大的乐山大佛，仿制泰山上刻有的“五岳独尊”四个字的石头，甚至是一块印有千岛湖景色的海报板，大量外地游客在此完成“到此一游”的合影。

经营上的艰难和混乱都是当时从房地产公司转到管理公司的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未曾想到的。而当水立方试图作出改变时，混乱依然在继续。

在与水立方合作的过程中，让马文与郑见伟崩溃的还有控制水立方灯光的电脑后台系统。供应商为了封闭这个项目，让这个项目在改造时都去找他，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别人动不了的语言，而非国际标准语言。这致使工程师花费大量时间去研究这个系统，而在完成改造后，新的灯光系统还是无法自动化，它需要有一个操作员天天坐在这里手动操作。

不过，马文与郑见伟还是对与水立方的这次合作感到满意，“在中国，甲方通常会认为我出钱我来定，能进步到我出钱请艺术家，这个事变成艺术家是主角的非常少见。”马文曾被邀请改造北京前门的一条老街，在项目进行到中间，她被迫出局，“中国很复杂”，马文说，“我人很直，想什么就说什么，不会保留太多，有时候想什么全都亮出来，这在这里不容易成事。”

马文与郑见伟倾向把水立方官员的慷慨，理解为他们对这座建筑理想主义式的期望以及充分参与后拥有的责任感。在建设水立方过程中，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团队在设计上就提供出很多建议，比如为了考虑到水立方的气质，他们加重了蓝光的比重，这使水立方留给了所有人一种难忘的而高级的蓝色印象。“一般甲方不可能细致到这种程度。”郑见伟说。而在与艺术家、设计师、公益人士合作的过程中，也改变了水立方管理层很多旧有的观念，甚至缓解了一种过度紧张。

“艺术家的工作方式让人很羡慕，全身心，没有经济指标的，你意识到一方面你要很辛苦地扛着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你也要必须享受这个过程，”杨奇勇说，从事水立方管理的五年里，杨的工作方式被迫发生着很多改变，“对内是一摊经营，对外又是很多政府部分、管理协会、各个委办局。你必须每天都在迎接很多新事物，现在每天我都要按照一个日历工作。”

2013年6月，《天人合一水立方》灯光艺术项目完成后，杨奇勇和他的艺术家在一个不常开放的南广场召开了发布会。来宾们将在那里直接看到水立方的新形象：蔚蓝色先是在水立方外立面缓缓升起，褪去后又膨胀，之后呈现不断变化的形状。

当天，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网刊发文章称“这个灯光艺术项目在向公众传达当前人们的精神状态的同时，还将反映中国传统的世界观”。

这个项目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水立方的运营状况，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它至少使水立方负责官员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那个晚上，参会嘉宾一直留到晚十点半才陆续离开。“那天环境很好，月亮很大，音乐也很好，大家喝着香槟，聊着天，氛围就上来了，他们很享受那个晚上。”杨奇勇十分感慨，“这给我一个启发，水立方可以提供更多这种感觉，它不应该永远都要是一个人流如潮的旅游景点。”

季艺是中国媒体人，供职于《人物》杂志。



水立方。

Courtesy of Ma Wen